

揭开红色中国内幕的外国友人 海伦·福斯特·斯诺

□ 魏雪巍



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并联系他们进行采访。海伦与斯诺还撰写了多篇文章为学生们加油鼓劲。1935年10月，海伦向《亚细亚》杂志投稿《中国青年再次被压垮了吗？》，该文集中反映了海伦对当时中国社会与青年问题的观点。她批判国民政府的青年政策，认为国民政府对青年运动的政策是法西斯主义的，扼杀了青年精神，中国青年应继续沿袭五四运动的精神。不过，由于当时的局势复杂，海伦的文章未能发表。

虽然投稿被拒或文章内容被大幅删减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海伦与斯诺的坚持写作与宣传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以后，正是以斯诺、海伦为代表的跨国记者、学者、技术人员、外交人员在中国与世界的频繁流动，推动中国共产党由点成线、由线成网地编织起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人际网络。

只身奔赴延安

在帮助斯诺写作《西行漫记》一书时，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经历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感人事迹令海伦备受鼓舞，她决心要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去，揭开红色中国的内幕。1936年，海伦开始了她首次远行，但遗憾的是，这次探索以失败告终，不过海伦并未放弃。1937年，她再次奔赴延安。海伦到达西安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情形十分严峻，国民党对于前往红军前线的外国记者更加警惕。在 Helen 到达西安后，国民党派多名警察看守，防止她逃跑。但 Helen 没有屈服，她想尽各种办法，最终在一名美国青年的帮助下，冲破门警的阻拦才成功逃脱。4月30日，海伦终于到达了 她一心向往的延安。

在延安的4个月里，海伦几乎每天都进行采访工作，她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学生，收集了大量资料。Helen 采访了至少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与毛泽东进行了数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Helen 的采访笔记更是多达27本。

此次延安之行收集到的珍贵材料不仅充实了斯诺当时正在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容，更直接促成了 Helen 自己的著作《红色中国内幕》。同《红星照耀中国》相比，《红色中国内幕》增加了许多前者未涉及的人物，尤其是对中国妇女群体参加革命的经历进行了详细叙述，让全世界了解了更加真实的中国 共产党与延安。

做人民的友好使者

1941年，Helen 回到了美国。回国后的她笔耕不辍，在她那台古老的英文打字机上，总共完成了几十部著作，其中有一半是关于中国的。但由于受到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大多数著作未能出版。Helen 对此却不以为意，她说：“我的书不是为了出版商所写的，我是为了中美两国青年人所写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诞生令 Helen 魂牵梦萦，她多么希望再到中国看一看。Helen 于1972年12月至1973年2月、1978年两次访问新中国。1972年的访问中，朱德、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 Helen。在湖南期间，Helen 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还到浏阳、文家市等地访问，追寻毛泽东率领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的事迹。1978年，Helen 又偕好莱坞的3名制片人再度来到中国，拍摄了关于中国的电视纪录片。

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 Helen “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1997年1月11日，Helen 在睡梦中静静地离开人世。Helen 的一生，是追求真、善、美的一生，是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一生。她架起了一座友好的桥梁，把中美两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Helen 的一生让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大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公生明，廉生威”：名臣年富的座右铭

□ 柯 昊

西安碑林中有一座官箴碑赫然镌刻着“公生明，廉生威”。这是由明代官吏年富书写的，刻石立于官署。

年富（1395—1464）历史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六帝，先后在地方和中央任职，曾任吏科给事中、陕西左参政、河南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兼大同巡抚、兵部右侍郎兼山东巡抚、户部尚书。《明史·年富传》记载，年富“廉正强直，始终不渝”，执政能“纠正违失，务存大体”，裁决则“果敢有为，权势莫能挠”，矢志不移以铭为诫，成为一代名臣。

初入六科秉公为民

年富初入仕途，就以公正和廉洁为吏属所畏惧，为民众所信服。永乐年间，他以会试副榜授山东德平训导，开始从政，主要辅佐地方知府，考察本地区秀才的功课，培养地方人材，弘扬地方文化。宣德三年（1428年），晋升为吏科给事中。在任上，他严格科考，纠正违失，明识大体，得到明宣宗肯定。明宣宗认为六科核查、监督南北两京的六部工作，还肩负着弹劾两京大臣失职行为的职责，事关吏治和政风，责任重大，而年富履职公正，可以掌管六科事务，于是年富被授命掌管刑科。在任职期间，年富秉公监察，严格执法，核查出都御史顾佐等人误判17人死罪。他不顾自己职低位卑，立即上奏皇帝，得以纠正误判，公正执法。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明英宗继位，年富上书为民事事，请求从诸驻军卫所内选一个卫所的兵士补充皇帝亲军中府军前

卫。之所以这样建言，是因为按过去惯例，府军前卫补充兵全部选调自民间百姓人家，而征召普通百姓家庭的壮劳力会干扰民众生活生产。初涉政事，年富就深谙为官公正和无私为民之理，凭借廉洁作风和公正行事，在政界和民间受到广泛肯定。

主政陕西明察革弊

宣德十年（1435年），年富升任陕西左参政，负责管理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等事。到任后，巡察各处，了解到当地赋税、边饷、军费有一系列积弊，立即推行系列改善弊政的措施。陕西在明朝时是西北边防重镇，军费负担本来就比较重，但在永乐年间，朝廷反而增加征收织驼毛毯五十匹。年富发现后，即奏请恢复原来每年的绢绢毯标准；陕西边防地区，军官屯田较多，戍边将领占垦腴田有的多达三四十顷，年富奏请让他们每顷缴纳赋税十二石。都督王桢认为这个数量过重，上疏降低标准。朝廷经过廷议商量，减去三分之二，成为定例；在厘定杂税时，年富发现因边饷减削，陕西官吏、诸生、卫卒的俸禄廩粮剧减，致使官吏及僚属难以维持生计，也奏请恢复原来的标准；在核算年度用粮情况时，他又发现赋税入不敷出的问题。根据核查情况，年富请求裁减闲散多余士卒，淘汰劣等马匹，杜绝侵占资源。当时明朝在陕西三边（定边、安边、靖边）驻有大量兵马，军民长途运输大量钱粮保证他们的供给，在途中疲惫不堪时，一些不法之徒趁机牟利。针对这种情况，年富亲自计算路程

远近，核定征收税赋数目，收支也一律认真谨慎考核，严控疏漏。通过系列革除贪弊、开源节流的措施，陕西赋税征收合理，收支逐渐均衡，财政赤字得到改善。主政陕西期间，年富果敢敏锐，沉稳决断，担当敢为，不受权势阻挠，因此声震关中。但也因年富触动权贵利益，屡遭诬告，陕西文武将吏害怕失去主政良官，均上表讲述其功劳。年富在陕西任职9年后，政绩突出，升任河南右布政使。

巡抚大同弹劾贪腐

景泰二年（1451年）春，年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出任大同巡抚，主理当地军政事务。明代巡抚兼都察院官衔在景泰时期确立，按照制度，监察官员不受其他官员节制，在地方集行政、军事、监察司法等权力于一身。初到大同，年富发现经历丧乱战败，当地法律松弛，纲纪不张，弊政众多。于是，他先体恤民情，上奏免除秋赋，撤除几个州县的税课局，让大原民众不再从大同转运粮饷。当地权贵贪污腐败问题尤其严重，武清侯石亨、武安侯郑宏、武进伯朱瑄让家人去领官库的银帛，再买来贩卖到边境，以赚取暴利。年富不畏胁迫，第一个请求查处贪腐，严惩涉案官吏，但景泰帝只是治了石亨等人家人的罪。之后，石亨及部下越发无视法纪，其兵将越界到大同。年富再次不惧强权，上奏朝廷，弹劾石亨专擅之罪。同时，分守中官韦力转、参将石彪及山西参政林厚等人也因违纪受到年富弹劾。一时，年富威名天下皆知，权贵之门愈发怨恨他，

被传染病拖累的罗马帝国

□ 曹颖新

国驱赶出亚洲北部的草原，他们向西游牧，带着他们的战马和生活方式，还带着身上的病菌。到了4世纪末，匈奴人控制了伏尔加河到多瑙河的大部分地域，建立了匈奴帝国。在他们不断向西扩张时，曾经是罗马敌人的哥特人、日耳曼人不但遭遇了匈奴人的战马，也遭遇了匈奴人身上的病菌，对此他们是没有免疫力的，他们打不过匈奴人，不断向西败退。这一过程导致了哥特人的分化，其中的西哥特人为了获得在罗马土地上的生存权，最终向罗马臣服。罗马因此解除了北部边患，但是如果从传染病的角度看，哥特人的涌入也给病菌大范围传播带来了机会，导致了4世纪末期的大瘟疫。

不仅是哥特人，1世纪到4世纪这300多年中，汪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在欧洲流动频繁，罗马人在与他们的战争中密切接触，彼此感染，人群之间彼此为敌，而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和病毒成为了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利剑。

二

战争、饥荒和瘟疫拖垮了罗马帝国庞大的身躯。公元3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把罗马帝国分为两部分，在意大利和希腊各设一个皇帝。西罗马帝国只延续了200多年，455年汪达尔人攻占了罗马，476年西罗马灭亡。东罗马帝国实际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权，在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的几代皇帝一直想收回日耳曼人攻陷的西欧和北非地区，但是没有成功。直到查士丁尼大帝统治时期，他在532年夺回了北非沿海地区，534年灭亡了汪达尔王国，并登陆了西西里岛，夺回了意大利本土。查士丁尼大帝还组织修订了法典，这是他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另一个载入史册的功

绩，他的文治武功使东罗马帝国进入了文治繁盛期。

就在查士丁尼试图继续向西进军，想攻占高卢甚至不列颠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敌人降临了。在542年春天，一场瘟疫袭击了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据症状和流行特征看，它是屡次在欧洲兴风作浪的腺鼠疫。这场瘟疫在初期死亡率相当高，把君士坦丁堡从繁荣之都变为萧然之城，而且它的传染性也很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传遍了帝国东部。这场瘟疫一下子打乱了东罗马西征的步伐，虽然后来死亡率下降，但它断断续续持续了52年。查士丁尼在这场以他名字命名的瘟疫中期，壮志未酬而病逝。东罗马帝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恢复到罗马帝国时代的辉煌。

三

从现代意义上看，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提供安全、发展经济两方面，都需要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提供安全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保持共认的政权稳定等等方面都需要强有力的军队、警察、司法部门来保障，而这些国家权力机构和部门的运作，需要足够的财政支持，财政又需要源源不断的税收来支撑，进而需要经济繁荣来维持较高的纳税水平。如果能做到这两方面，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就算是较强的了。

即使用以上这两个今人的标准来看，可以说，罗马帝国的国家能力都够强大。罗马军队的实力绝对能位列历史上国家军队的前列，它的军队能保证在多个边境与异族同时长期作战，而帝国内部一旦有叛乱，也能被迅速平定，罗马军队的强大作战能力、迅速反应能力、高效组织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而其中一个很细微的方面就是明证，这就是遍

联合收集年富罪名。幸好当时景泰帝和主政的于谦了解年富多年履政经历，信任其为人做事的“公”“廉”品质，才不致被诬陷，并能够继续铲除弊。天顺四年春，户部缺少尚书人选，李贤推荐年富，一些大臣委婉阻止。明英宗坚持征召年富担任尚书，对李贤说：“户部不能没有年富，人们大多不喜欢他直言敢谏，但这才是年富贤能的原因。”年富在任时，亲自参与核算，斟酌赢亏，严格收支，属下不敢有所欺瞒。但如果涉及重大事宜，同僚和属下不敢处置时，年富勇于担责，说：“你们只要大胆做就行，一切由我来承担责任，不要署上你们的名字。”因此，户部总是能妥善处置棘手问题。

年富在仕宦生涯中做到了“官”“箴”合一，使“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其居官从政的修养和品德，得到广泛传扬。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山东泰安知府顾景祥尤为赞佩年富判行的官箴，刊刻立碑泰安州署。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任泰安知府的颜希深在衙内残壁中发现顾景祥刊刻的官箴碑文，受益匪浅，移此碑于官署西厢房。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颜希深之子颜检升任浙江巡抚后，继承父训，刊刻箴文于衙门厅壁。年富官箴始在浙江流刊。清道光二年（1822年），颜希深之孙、颜检之子颜伯焄，任陕西延榆绥道台，携拓片上任，为自勉和示戒同僚，刊刻立碑，即是至今完好保存于西安碑林内的官箴碑。



1939年，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纽约出版，书中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故事，为许多外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视角。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同斯诺一样，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

支持“一二九”运动

1907年，Helen 在美国犹他州塞达城的一个律师家庭出生。年轻时的她曾立下志向：成为一名作家。1931年，24岁的 Helen 带着家中的一台相机来到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期间，Helen 结识了美国外交官保罗·休斯顿。这位目睹了广州起义、同情中国共产党境况的美国同胞，给 Helen 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之受到宋庆龄、鲁迅等友人的启迪，Helen 毅然决定留在中国，投身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解放事业中。同样在上海，她与志向相投的斯诺相识相恋，结为伉俪。

后来，Helen 与斯诺前往北平定居。据 Helen 回忆，自1934年起，他们对于法西斯主义即持怀疑批判态度。Helen 与斯诺的反法西斯立场成为之后他们支持学生运动的动因。1935年12月9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数千大中学生发起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Helen 与斯诺也参与了这场运动。

Helen 与斯诺曾多次、多渠道地联络英美媒体，以引导国际舆论支持学生运动。他们的家成为当时的新闻中心，外国记者、中国学生都常去找他们打探消息。Helen 与斯诺曾把《平津10校学生